

我的精神自传

My Retrospection and Ref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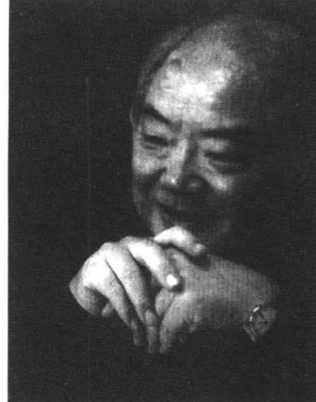
钱理群 著



上篇 我的回顾与反思
 引言 “以不切题为宗旨”
 一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 (一)
 二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 (二)
 三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 (三)
 四 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向题
 五 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向题
 六 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
 七 关于理想主义的反思
 八 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向题
 九 个人主义向题
 十 与北大教育
 下篇 我的精神自传
 引言
 一 历史的中断
 二 历史的中断
 三 历史的中断
 四 历史的中断
 五 历史的中断
 六 历史的中断
 七 历史的中断
 八 历史的中断
 九 历史的中断
 十 历史的中断

K825. 6/274

2007



我的 精神自传

My Retrospection and Reflection

钱理群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精神自传/钱理群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

ISBN 978 - 7 - 5633 - 6917 - 1

I. 我… II. 钱… III. 钱理群-自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567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380mm 1/32

印张:12

字数:350千字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目 录

上篇 我的回顾与反思

引言 “以不切题为宗旨”	3
一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	12
二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34
三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下)	58
四 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	77
五 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	99
六 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	115
七 关于理想主义的反思	135
八 关于思想与行动的关系问题	147
九 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	171
十 最后的话题:关于大学教育与北大传统	190

下篇 我的精神自传

引 言	225
一 历史的中间物	227
二 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	248
三 幸存者	268
四 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	286
五 真的知识阶级	319
六 思想者与实践者	337
七 漂泊者与困守者	352
后 记	374

我的回顾与反思

“我的回顾与反思”，副题“北大演讲录之三”，系作者2002年3~6月在北大讲“最后一门课”的讲稿[其中引言部分讲于2002年3月12日，第一部分讲于2002年3月12日、21日，第二部分讲于2002年3月21日，第三部分讲于2002年3月28日，第四部分讲于2002年4月8日，第五部分讲于2002年4月15日，第六部分讲于2002年4月22日、29日，第七部分讲于2002年5月9日，第八部分讲于2002年5月16日、23日，第九部分讲于2002年5月30日、6月6日，第十部分讲于2002年6月13日、20日、27日]，由学生录音、整理。2006年、2007年作者根据录音整理稿，作了一些补充与发挥，补写了几篇文章，最后成书。

引言 “以不切题为宗旨”

这学期我要给大家讲的是“我的回顾与反思”，但同学们在课表上看到的这门课的题目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背后有一个故事，简单说，是我和我们教研室的主任陈平原教授合谋的一个结果。

大家知道，这些年学校教育一直在进行“制度化、体制化”的努力：开什么课、课程的题目都是规定好的，并且是输入电脑的。老师开的课，符合计划要求的才算数，才算老师的工作量，给听课的学生学分；不符合的，就予以承认。应该说，这样的规定，并非毫无道理，教学的随意性太大，也会乱套。但对我这样的自由惯了的、喜欢奇思异想、不怎么守规矩的教授，就有点麻烦不便。理想的教育应该是既有规范，又给不规范的课程提供一定的空间。

应该说陈平原先生是颇懂此道的。因此，当上学期末，他问我这学期准备上什么课时，我答以要讲“我的回顾与反思”，他犯了难，却马上想出一个办法，对我说：教学计划中有“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这门课，你就报这个题目，至于上了课堂，你讲什么，怎么讲，我不管。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我马上想起了周作人对付命题作文的办法，就是“以不切题为宗旨”。——对于一个追求自由的教师、学者、作家，任何规范都是难不住他的，这也是有传统的。

因此，我今天的课，也是“以不切题为宗旨”：题目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讲的是“我的回顾与反思”。

记得我在北大开的第一个独立课程，题目是“我之鲁迅观”。——在此之前，我上过一次“现代文学史”，是接着严家炎老师上的，当时老师有事，让我接着上课。正式独立的开课，是讲“我之鲁迅观”，是1985年上的。今天这个课是我在北大讲坛的最后一课，时间是2002年。第一课和最后一课相距十七年，始于“我之鲁迅观”，终于“我的回顾与反思”：这本身或许有某种象征性，或者说显示了我的做人与治学风格的某些侧面。

这使我想起了“我之鲁迅观”这门课的某些命运。

我是给1981级的学生讲的。——顺便说一句：从1981级讲到你们2001级，也就是说有二十一届的北大学生听了我的有关鲁迅的课，我觉得挺高兴的，也觉得很有意思：向连续二十一届的学生讲“我之鲁迅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劲头。

而且讲“鲁迅”这样的历史巨人，却要突出“我”，强调研究者、讲课者的主体性，这在今天恐怕都有些出格，1981级学生听起来自然觉得从未听过这样的讲法。但北大毕竟是一个眼界开阔的学校，学生虽然觉得奇怪，但基本上是接受的。一传到社会上，特别是鲁迅研究界，就引起了出乎我意外的反响。

当时在武汉召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讨论在高校如何开鲁迅研究课。本来我还只是个助教，尽管年纪也够大了，但还没有资格参加，我的导师王瑶下命令要让我去，我只好去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没想到引起强烈反响，当然有一部分人赞同，但更多的是愤怒与嘲笑：钱理群这人太狂妄了，什么“我之鲁迅观”？！他竟敢把自己跟鲁迅并提，居然宣称“既不能仰视鲁迅，也不能俯视鲁迅，要平视鲁迅”！——这个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常识，但是当时就被认为是对鲁迅研究的“仰视”的既定格局的一个严重挑战，这就难免被视为“狂妄”了。顺便提一句，我这个观点同时又受到一些年轻人的指责：钱理群平视鲁迅不对，就应该俯视鲁迅。这大概也很有象征性：我这个人一辈子就处在年长者与年轻人的质疑中，受到两方面的夹击，这也是我的命运吧。

我的发言既然引起轩然大波，就要导师来收场。王先生处理得非

常高明。他先声色俱厉地把我批评一通,老师要找学生的碴儿太容易了。譬如我当时强调上课要跟学生交流,要重视学生的作用;他说:这哪儿行啊,教师讲课当然要以教师为主,不可片面强调学生的作用。王先生这一说,那些人高兴了:你看,他的老师批评他了。但最后王先生又轻轻说一句: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在北大上过鲁迅课,钱理群讲课比我好。我当时还没领会老师的意思,觉得挺别扭的,后来有朋友告诉我:王先生说你上课比他好,这是极高的评价,就是对你的课的充分肯定,最大支持。我这才恍然大悟,并且非常感动。

当时我已经四十五六岁了,但在学术界还是初出茅庐,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刚刚闯了祸,过几天我又发表一个言论惹来了新的麻烦。我也搞不清是在一篇文章还是在一个公开场合,发表了这样一个观点:学术研究应该有想象力,掌握了一定材料后,就必须产生一个飞跃,提出一个假设性命题。你不可能掌握全部材料,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你不可能重现历史,你总是在有限材料基础上,或者通过理论推理,或者通过想象,提出假设——不仅科学研究,文学研究也需要假设。有了假设,再去发掘材料,新的材料可能否定或者修正你的假设,如果新材料证明你的假设,那么假设就可能成立。如果我的话只说到这里,大概不会捅太大的漏子,但我又多说了,批评有些研究者是“爬行现实主义者”,他永远在材料上爬来爬去,不能产生飞跃。这就惹了大祸了。有些人就对号入座,说钱理群太狂妄了,竟然说我们都是爬行现实主义者!

我这个思考其实是作为一名北大学生,对老师的研究方法的一种领悟与理解。我非常欣赏林庚先生的研究,大家知道林先生有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提出了“盛唐气象”的概念。他这个概括在我看来是有材料有根据的,在材料基础上又有他诗人特有的感悟力,特有的敏感与想象,从材料的积累到概念的提出,有一个飞跃与提升,是对研究对象(盛唐文学)的一个整体把握,是将个别现象排斥在外的。因此,总是可以找到好多材料来反驳,当时好多学者也是这样提出种种质疑。但是经过历史淘洗,他的这个概括今天看起来就特别有道理,非常有启

发性。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八十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他也是掌握材料基础上提出一些飞跃性的概括，这些概括对我们很有影响。当然你也不难挑出它的许多毛病。但是这样的研究会打开新思路，启发新思考，抓住一些最大的问题，可能忽略某些细节。我把这种研究称为“浪漫主义研究”。当然任何研究都有它的弊病，没有任何一种完美的研究方法。我当时提出有现实主义的研究，也要有浪漫主义的研究，以浪漫主义反对爬行现实主义，不过是想寻求研究的多种途径，打破既定的、在我看来多少有些僵化的研究格局，这在一个初入学界又不想墨守成规的“年轻人”，是非常自然的。

但我又闯了祸，惹恼了当时的一群人，又惊动了老师。王瑶先生私下里找我谈话，他说了两个意思。第一他说，钱理群你是对的，学术研究就是要作假设，我理解你的意思——后来我在看王先生著作时发现他也有类似意思，不过我当时没看到，所以算是我自己的心得，不是从先生那里偷来的。但紧接着王先生又劝我说：你在学术界还没有站住脚，你不要那么冲；学术研究既要显出你自己的东西，又要讲策略，你得要存在，要不别人掀倒你太容易了。后来在写王瑶先生的回忆文章里，我对他的教诲有这样概括：研究者本身不得不考虑保全自己的问题——鲁迅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研究者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如何做中国的学者”，这实在是一门大学问。王先生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他一再告诫我，在学术研究中，既要有“求真”精神，绝不可做违心之论，但也要注意掌握分寸，掌握“什么时候，可说，不可说，说到什么程度之类的分寸”。后来我看到王先生在一篇纪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引用朱先生《论气节》一文中所说：“‘气’是积极的有所为，‘节’是消极的有所不为。”先生自己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这使我想起人们常说鲁迅是思想文化界的战略家、策略家，其实一切希望在中国生存下去的文人学者都是不能不考虑战略、策略、方法这类问题，王瑶师不过是这方面更为自觉而已。他一贯主张的“打太极拳”、“擦边球”以及“外圆内方”之类，一

定意义上都是自我保全的手段。对一个一意求真的学者,这样的考虑是不得不然的;如果能够不,最好不。但是在中国条件下,你就不得不然,并且伴随巨大痛苦。而且“外圆内方”、“务实与求真”的要求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可以说“内方”、“求真”的要求是更为根本的。出卖原则的策略家仍然是鲁迅和先生嗤之以鼻的做戏的虚无党,坚持真理、爱憎分明才是先生的本色。这是很复杂的问题。今天回顾我自己的道路,大体上是遵照王先生的教诲,但不完全,我这人性格太烈,常常就不是外圆内方,而是外也很方,就要出很多麻烦。当然根据自己的个性,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很难说哪一种就是最好的。但有一点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既然生存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就得认真地考虑“如何做中国的学者”,而无论如何,也得坚持为人学的基本原则。

在以上的聊天中讲了自己学术起点的情况,这大体上就决定着我的研究的特色、道路和命运。我在《六十劫语》有一篇文章有这样概括:钱理群在学术上有许多自己独立的追求,但是在坚持以上方面的追求的同时,又不断地进行自我质疑,对他的研究的得和失,学术界一直持有不同的评价和争议。他的学术著作很少得奖,这本身就构成了钱理群学术风格的一个特点。这是确实的,我的研究工作在学术界从来是有争议的,或者说是爱憎分明:喜欢就非常喜欢,讨厌就非常讨厌。我自己很满意于这样一个命运。因为一个学者,不能要求大家都说他好,有争议就说明有特色,有特色就会有问题。这是一个钱币的两面。鲁迅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文化偏至论》,我就希望自己做一个“偏至的学者”,而不愿做一个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人人说好的学者。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到我的研究是一个“野路子”,这是我和一个朋友王乾坤在通信中讨论到的一个问题。我是这样说的:“这又有什么办法呢?鲁迅绝非书斋里的学者,他往往直接影响人的灵魂,进而影响整个民族发展进程。因此他永远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存在,我读鲁迅的书从出发点上就不是把它当作古董,或者作纯学术的考究,而

是带着人生种种困惑、苦恼、渴求,到他那里去寻求心灵的启示,学习如何做人,在学习中慢慢知道其人其事,积累的多了,因为种种机缘,就倾诉而为书。我研究他,不是在学院中把他当作研究对象,而是把他当作引导者,首先学会怎样做人,然后有体会,写成书就是《心灵的探寻》。至于人们承认与否是无所谓的。”所以乾坤说:“学院里的正宗理论家怎样看待我的作品,远不是我所关心的,但是如果引不起人们心灵的对话,这却是我所害怕的。就是说我的书是否得到理论家重视,在我看来不重要;即使成了废纸,得不到感应,我也并不遗憾。因为我没有阉割自己,而是抒写了自己的思考,这也是人生一大乐事,一种基于生命的精神享受,这才是我的最高目的。”这也许被认为大逆不道,但书既然出来了,就成为一种社会存在,再也抹煞不了。于是就会引起人们心灵的震动,也会引起一部分人不舒服,甚至骂娘、跳脚,不管怎么样,一些人心目中的一统天下就这样被打破了。

这就是说我的学术道路,开始是野路子,不被学术界承认,但后来当你强大到一定程度,就不得不承认,好像我现在也被鲁迅研究界承认了,而且好像还不容易绕过。但我得承认在有些人眼里,我又成为权威。当我被学术界承认,甚至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权威时,我又面临新的问题。首先,在承认的同时,就是把你规范化。鲁迅先生讲梅兰芳,说他也是来自民间,有一点猥下、肮脏,但是泼辣、有生气,后来把梅兰芳请进宫廷,所谓被承认了,也就是把他罩进玻璃罩子去,待他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鲁迅的这一分析,是被许多人视为“偏激”之论的,但我每回读到这里,都有心惊肉跳之感。因为我自己在被承认的同时,也面临着被规范化的命运,因此就有了新的苦恼。而且你还要警惕:当你成为一个权威,你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你的话语霸权,成为新的压迫者。

这里我想说说我的一个隐痛:未曾公开的反省与忏悔。大概是前几年的一次博士生面试,我是考官,当然掌有决定学生命运的生杀大权。有一个学生来参加考试,这个学生说了一些不恰当的大话,没有什么材料依据,也不加论证,就得出一个很可怕的大结论。而且这个

学生在我看来是十分狂妄,觉得自己的就是最好最对,其实从学术上看毛病很多。我这人脾气很好,但有时也会发脾气,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突然愤怒起来,我就利用我的知识优势,连续向他问四五个问题,并非常严厉地训斥他。最初我很得意,但他惊恐又不以为然的神态使我一震。——应该说,指出学生的错误,提出质问,这本身并无问题,这也是教师的责任与权利;问题是我的权威心态,我的训斥中的不平等态度与霸气,这就形成了利用知识权力对学生的压抑。现在我又想起这件事儿,就觉得脸红与不安,而我也没有机会再向这个学生道歉。我这样做很可能使学生的自信心受到很大伤害,有可能影响他未来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称为鲁迅所说的“精神虐杀”。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无论如何,不能以势压人,一定要与学生保持平等的关系。这还涉及另一个大问题,即对自己的讲课和学术著作的基本定位和评价。我在给1997、1998级上“话说周氏兄弟”这门课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我是很诚恳的,可是大家不大注意,这里再重申一遍:无论是我的著作,还是我的讲课,无非表示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纪末,有这样一个人,这么一个钱理群,他对鲁迅、周作人或者对现代文学有这么一种看法,有这么一种思考,如此而已。然后大家听了我的课或看了我的文章,自己去做自己时代的独立思考。每一代人、每一代个体生命,他们都有自己思考的题目、方式和结论,是他人所不能代替的。但同时各代人之间、各代个体生命之间,又有某种历史连续性:我们既在继续前人的思考,又在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我讲这门课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大家去独立地、自由地思考。当然会有同学拒绝思考,我也不要求大家都来思考,或者不要求大家都来做思想者。因为在现实中国,思想者既是艰难又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即使你不做思想者,我对于你也有个小小的请求:请理解别人的思考。”

今天我重复这一点,是要强调,我们这门课主要意义在于我自己:这是一门为我自己而讲的课,借此机会做一点自我回顾、自我总结。对于同学们,一不是经验介绍,更不是树立样板、建立规范;相反,我要

强调的是自己的研究的时代性与个人性,以及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重复性。当然,人生与学术问题也会有某种共同性,因此,讲我自己的研究、思考与反省,特别是反省,可能在某一点上对于准备或开始走上人生之路与学术之路的年轻朋友起一点启示作用:仅此而已。总而言之,我姑妄讲之,诸位姑妄听之就是了。

另一方面,我还要强调一点:任何特点都意味着某种局限与缺憾。我对我的《周作人传》有一个评价,其实是对我的所有的学术著作的自我评价,就是这是一本“具有有缺憾的价值的书”。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一个有明显缺憾的学者。因此,我前面说过,对我的学术与讲课存有争议是正常的现象。我上这门课,给同学们讲“我的回顾与反思”,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引发同学们对我的研究、思考,进行争议,提出质疑,和我一起来反省反思。鲁迅曾经说过:“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做教师的,最害怕的也是学生毫无反应。

我想讲到这里,大家可能知道我这个课的性质了。我这个课要自述、回顾、反省,是相当个人化的课程。我在北大教了二十多年的书,快要退休了,就想给自己这一段生命历程做个小结。因此,对我这个人和学术无兴趣的同学,完全没有必要来听这门课。而有兴趣的只能是少数。所以我觉得今天来这么多人是不正常的,现在把这门课的性质讲清楚,同学们就可以有一个自由的选择。最后留下来的,我希望能够进行无拘无束的对话,亲切的聊天。近年来,我经常感到自己和年轻人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同学们也很难见到我。倒不是我有什么架子,实在是太忙了,年纪也大了,精力有限。大家知道,我这个人要是离开跟年轻人的交流,我的思考、学问都没有了,我是需要在和年轻人的撞击中产生思想火花的。离开北大,对我最大的损失,就是失去一个固定的、经常和年轻人交流的机会,尤其是北大这群年轻人。所以我把这门课看作是和北大学生作一次比较系统的、长时间的、全面

交谈的最后一个机会。

大家上这门课,要看我的话,最主要的是以下几本:关于鲁迅的是《心灵的探寻》、《走进当代的鲁迅》、《话说周氏兄弟》,以后还会出一本《与鲁迅相遇》;关于周作人有《周作人传》、《周作人论》,最近天津古籍出版社新出的有《读周作人》。另外学术著作,还有研究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曹禹戏剧新论》、《1948:天地玄黄》。还有一本书可能会频频提到,就是《反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另外几本随笔集:《压在心上的坟》、《世纪末的沉思》、《六十劫语》等,大家随便翻翻就可以了。

一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

现在开始讲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学之路。六十多岁讲传记材料似乎有点早,按照中国传统应该到七十、八十岁。但是我又一想,万一死掉怎么办?所以现在先来讲一点,其实这些材料以前都在书里写过,今天不过是系统化一点,再补充一些细节。

我曾经说过,我的研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还债”,一个是“圆梦”。

那么,我有什么“债”?简单说起来,是三笔债:欠家庭的债,欠年轻人的债,欠自己的债。

我的家庭

先谈家庭。我出身于世家。外祖父项兰生,他一生经历很丰富,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到1959年去世。我昨晚还在看他的年谱,看得津津有味。外祖父出生于1873年,是晚清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王韬的学生。他的年谱里有一段对王韬的回忆很有意思:“韬师住四马路十路……韬师谈论甚豪,论天下大势,历两时许,滔滔不绝。”第二天他又请外祖父吃饭,“并赠著述十数种,以后往见数次,几曾嘉许,颇得教益,并尝曰通书后,对于八股文不必看的太重,务必多读史书,认识世界大势,为立身行己基础。功名问题,可以坚决放弃。”这里记述了我